

天鹅湖畔

陈世旭



百花洲创作丛书

百花洲创作丛书

I247.7
900

3

天鹅 湖畔

陈世旭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天 鹅 湖 畔

陈 世 旭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73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.445 190千字 印数: 1—4,500 1985年3月第1版
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110·341 定价: 0.94元

目 录

小镇名人录(一)	1
瞎 拐	1
六指头	24
陶东离	35
黄刘氏	42
船过滩头	53
暖色的光斑	69
我们的郝经理	86
遥远的地平线	107
天鹅湖畔	173
后记	299

小·镇·名·人·录（一）

瞎 拐

—

“秀才在么？”

门外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。

这样称呼我的，只有一个人，而且那是在极远的过去。我狐疑地从椅子上转过身来。

一个老头子，正吃力地把用一根粗木棍挑在肩上的铺盖卷挪下来，又胡乱地把它支靠在门边上，然后，挟紧腋下的拐杖，尽可能快地向我走来。他的

下巴翘着，空着的一只手，老远就抖抖索索地伸向我。

我“嚯”地一下站起来。他已经摸到我身上了：

“这是你么，秀才？啊，真是你！”他连连说，拼命眨着朝上翻的青光眼，拐杖移了移：“怎么不作声？不记得我了？我成了个老精怪，是么？”

他并没有指望我回答。

“嘿，见鬼。好不容易见面，尽说些背时的话。喂，秀才，我不是来跟你诉苦的。有个事拜托你，怎样？现在不是又讲‘百花齐放’了么，镇上还搞不搞曲艺队？我还想把先前那个老行当捡起来。我想来找领导说说，看能不能给我落实个政策。”

“落实政策？你？”

“怎么，要不得？”他的青光眼又连连眨起来。

“试试吧。”我搀起他的手，去见站长。

站长当即就给了我们满意得不能再满意的答复：由文化站出面，给这位前来要求“落实政策”、曾经名噪一时的民歌手打场子，收入按比例分成。明天晚上就可以开始。这同过去那个曲艺队的经营方法是一样的。事情得到这样顺利的结果，连我都深为惊讶。

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吃晚饭的时候，他讲起他十二年来的历险记，讲起从这里流落出去以后，怎样收了几年破烂；后来挑不动担子了，又做篾；做不几久，公社封了山，没有竹子，又去补套鞋。有一回，从人家送来补的套鞋上，剪下一块皮子，补到他特意收来剪皮子的废套鞋上，结果补了半天，他倒发起火来，骂：哪个穷发了瘟的，这样烂的套鞋，还有个鸟补头么！云云。然后他开心无比地大笑起来。他满脸红光闪闪，用巴掌隔开我伸过去的酒壶。“不过，酒是不能再喝了，倒了嗓子算哪个的？让我睡吧，我累了。”说着，他用拐杖支撑着站起来，爬到床上，拉开被子，就一动不动地睡去了。

他太累了。

二

文革前，我们镇文化站曾把一些民间艺人弄到一块，打算根据收入的情况，逐渐弄成一个自负盈亏的民办团体，刚刚弄出点眉目，就被横扫了。这就是他那个念念不忘、视若神祇的所谓“曲艺队”（这个名字，当时只不过是为了方便，随口喊出来的）。

成立这个“曲艺队”，是站长一次参观后忽然

心血来潮的结果。从此以后，每到夜晚，镇文化站就被镇上的三教九流，男女老少塞个水泄不通。二胡三弦、长箫短笛、竹连板、惊堂木，搅混着呢呢呀呀的小曲、尖声尖调的山歌，加上不时响起的粗野放肆的喝采，震耳欲聋，夜半方休。

曲艺队中，有一个就是这位从镇外乡下来的又瞎又拐的歌唱家。站长让我有幸的这位据说是誉满四乡的歌唱家同处一室（当时，我在文化站独自占据了一间极狭小的阁楼）。

每次在那要人命的骚扰结束之后，我还没有来得及从咬牙切齿的愤怒中透出一口气来，就只得忍受这个又瞎又拐的人的进一步折磨。

“笃、嚓，笃、嚓，笃、嚓……”他挟着包铁头的拐杖，艰难地爬上又陡又窄的木楼梯。“笃”是拐杖敲出的响声，“嚓”是脚踏出的响声。这种沉闷单调、不知轻重的响声，每下都象打击在我那颗脆弱的心上。

他的拐法是有点特别的。那只孤独的右脚只有前掌落地，每次左边的拐杖前移落地后，这只先前落在地上的前掌就有力地拧一下，在地上留下一个清晰的类似逗号的印子，再向前提起。由于拐杖的铁头在地上留下的恰好是一个深深的圆点，这样，他来时不几天，镇上一些极为敏锐的观察家就才气十足地把他的运动形式，图解为逗号和句号的无限循

环。上楼以后，他每次都兴犹未尽，在这间狭小屋子的两张单人床之间，不停地进行着这种循环。

“真好，你们这里，真好。作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日子！”他满足得就象一个从地狱里升上天堂的人，“真是好，这样多的人，拿我当宝……啊，你怎么从不下楼呢？夜夜坐寒窗，给情姐儿写信？嗬嗬……”他得意忘形地笑起来。

最初，为了礼貌起见，我每次都从鼻子里“唔唔”地支应他，心里却是怒火中烧。我死死地盯住他那双死鱼一样的青光眼。我真巴不得他能看见我在对他实行怒目主义。

可恼的是他看不见。他也似乎并不注意我是否和他答腔了。好象他从来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，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敷衍、甚至根本不用答理的客人。走着，说着，他竟自顾自唱起歌来：

从来不唱《拆白歌》，
风吹石滚飞过河，
大树梢上鱼打子，
急水滩头鸟做窠，
黄牛下了水牛婆，
……

不知反复唱了多少遍之后，他才忽然打住，

“都快四十的人了，还象个伢子，发起疯癫来没有个了时。打搅你睡觉了，是吧？”他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着，一边搁下拐杖，瘸手瘸脚地脱了衣服，钻进被窝，口里还在嘟嘟哝哝地念着：“哎，真好，真好……”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打起鼾来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的我，刚刚有了一点朦胧的睡意，他床上又窸窸窣窣地响起来。“从来不唱《拆白歌》……”他哼着，穿衣服，叠被子，挟起拐杖，把气得几乎要捶床板的我丢在一边，“笃、嚓，笃、嚓”地下楼去了。接着，在屋子后面的河边上，“啊哟鸣呀”地吊起嗓子来。

唱山歌的吊嗓子，真是前无古人。他纯粹是到这里来了以后，向河斜对过的县剧团的演员学的。他的发声一点也不规范，完全是高一声低一声的瞎叫。他当然也并不知道有什么规范。以为这仅仅是跟挑担子的力气一样，练得越勤，喉咙的劲就越大，就越能唱得多。

毫无疑问，他一定觉得，不久之后，全世界都将为他倾倒。

在绝大多数小镇人看来，他的确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。他演出时的盛况，决不会下于当代最出风头的艺术家的演出。不过，我一次也未能躬逢其盛。我很难想象，那些打情卖俏的村言俚语，那些

粗俗不堪的怪腔怪调，同艺术会有什么缘分！

我终于忍无可忍。

有一天，当他爬上楼来，又开始哼起那已经让人听得耳朵起茧的什么《拆白歌》的时候，我并拢四指，在桌面上连连用力敲了几下：

“喂，你不能自量一点么！只顾自己高兴就不管别人死活了。要晓得，你只不过是一个……”下面我想说的是“你只不过是一个连城镇户口也没有的又瞎又拐的乡下佬，卖唱的！”

但是我没有来得及说出来，已经发现自己有些过分了。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很难看，象一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却受到了责罚的人那样，惊惶地面向我僵住了。就这样足足地愣了几分钟后，他好象终于明白了什么似的，悲戚而谦卑地弓下了腰，然后回转身，蹑手蹑脚地象一条蚯蚓一样钻到被窝里去了。

从此以后，他夜里上楼和早上出去，都默默地尽可能不弄出一点声响。有时候，楼下散场之后，我听见他怡然自得地哼着“……风吹石滚飞过河……”可是一踏上楼梯口，歌声就嘎然而止。为了消音，他甚至还特地去附近的皮匠店，在拐杖的铁头底下，钉了一小块橡皮。当不得不在我身边活动的时候，他就象一个影子那样无声地飘过来、飘过去，只要一到我跟前，他脸上就现出一副知罪者的

悲戚和谦卑神情。这渐渐使我多少有些疚愧。

直到出现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，这种尴尬局面才被打破了。

小镇上，先前总是乐于互相恭维的人们，忽然在一夜之间，一部分变成了慷慨激昂、义愤填膺的革命闯将，一部分变成了十恶不赦、罪该万死的反动黑帮。

文化站首批受到“革命”的光顾。人们在这里检抄出许多早已发黄的唱本：《梁祝姻缘》、《牛郎织女》、《王宝钏寒窑十八载》……这是我们那位歌唱家的命根子。没有事的时候，我见他总是拿在手上翻着、摩挲着，把哪怕是极微小的一点点卷角抻平。尽管他连上面究竟是什么颜色也搞不清楚。

“把瞎子揪出来！”

“不准拐子放毒！”

“瞎子、拐子”的一通怒吼以后，善于概括的主持人喝令道：

“瞎拐，交待你的罪行！”

“各位革命老倌，”“瞎拐”的头缓缓地作180°旋转，青光眼一下一下有节奏地眨着，“我么，作孽太多，前世有，后世也有，大大小小算都算不清。从哪头说起呢？”他十分诚恳。

“从最小的说起！”

“对，从小到大！”

“最小的……最小的……” “瞎拐” 嘟哝着，仰起脸，青光眼定定地凝视着结满了蜘蛛网的屋角，认真地回忆着。“有啊。有一回，我烟瘾来急了，烟衔到嘴上，通身上下摸了半日也没摸到火柴，又伸出巴掌到桌上去摸。总算摸到了，连忙拿起就划。咳，那晓得，这是别人的火柴。丢人现世啊，偷火柴……”

“瞎拐” 沉痛地低下了头。

“胡扯！”

革命老倭里，有人忍俊不禁。

“瞎拐，你放老实些！说最大的！”

“瞎拐” 浑身一颤，象受了惊吓似地张大嘴巴：

“最大的么？我说，我说……先前，有一回，我想、想当地主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先前有一回，我想当地主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土改那年。”

“说清楚些！”

“土改那年，工作同志给我定成份。我说，你们让我当地主吧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想当地主？”

“地主日子好过啊。当初，要是我老子是地

主，哪怕是个芝麻大的地主，他就不会早早折寿，丢下一个瞎拐子在上世上讨米了。不过，那一回，我没有当成地主。工作同志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说我没有、没有阶级心……过后，我就再也不敢作地主梦了……”“瞎拐”的声音知罪地低下去，一脸诚惶诚恐。

主席台上的革命家们面面相觑。

对“瞎拐”的最后判决是让他立功赎罪，条件是大唱革命歌曲。

“新派的曲子我不会呀。”他很惶惑的样子。

“那就还唱你的老曲子。不过，要换新词儿。”

“要得，要得。”

此后，小镇各处，可以每天不断地听到“瞎拐”嘹亮的革命歌声。他唱的老是《拆白歌》的曲子。沿用这个曲子，是得到小镇革命的最高当局批准的。根据是它调子高亢，适于表现革命的内容。

文化革命唱凯歌，
天翻地覆奇迹多：
清水点得油灯着，
团子不用米来磨，
油瓶敢把老鼠拖，

……

传统的东西总是比新生的东西更容易在人们心里生根。对小镇人来说，唱用他们儿时就已熟稔的这类曲调新填词的歌，比唱那些“战歌”、“语录歌”之类来得更方便、更有味些。这样，“瞎拐”为那个时代歌功颂德的这类赞歌，就极为广泛而深远地流传起来。时至今日，还有人会时不时不自觉地哼上那么一、二句哩。

“瞎拐”的卓越贡献使他颇得赏识。他的政治处境很快就改善了。他整天又象刚到文化站曲艺队来时一样快活。

只有我知道庐山真面目。

每次，他回来的时候，“笃、嚓，笃、嚓”的声音不象先前那样明快、均匀了。它变得拖沓、紊乱，老是磕磕碰碰的。回到房里，他总要在门背上靠好一阵子，然后才一个逗号，一个句号地捱到我的床前，摸摸索索地把我搀扶着坐起来，给我喂他带回来的饭食。若是晚上，还得给我换一次药（这些药，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）。他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不声不响，面色如灰，象一个憔悴、悲伤的父亲。似乎我们之间，从来也没有过任何龃龉。他一次也没有提起（哪怕是暗示）我过去对他的侮谩。

这只能使我加倍痛苦。

那段日子里，我病得可以死十次。我已经完全

绝望了。我的罪过是无法洗清的，我的一首曾经在全省赛诗会上获奖的诗，足以致我于死命。诗云：

“喜迎晨曦大步迈，扬鞭钓起太阳来……”竟敢鞭钓太阳！“太阳是什么？你说！你说！你说！”革命群众怒吼。我吓呆了，全身发抖。我说我是无限忠予的，是无限热爱的，我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这颗心可以掏给诸位仔细过目。我呼天抢地，我声咽气绝。但这只能引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，遭到更疯狂的毒打。

“你何必总要当真呢？”有一次，当我被人架着，抛回我那张狗窠一样的床上的时候，这精疲力竭爬到楼上来的歌唱家，默默地在我床前站了一阵，突然说。这是我们长时间来第一次说话。“跟他们缠得清的么？”

“你不要……不要忙……我是好不了的……就是好了，又有什么活头……”我无力地捶打着胸口，声嘶力竭地、象蚊子一样微弱地叫喊。

“莫，莫，秀才……哼哼”他劝了两句，忽然冷笑起来，“你们读书人，原来这样蠢啊。先前我以为，你有多么了不起呢。”他到底提起往事来了，“当初，你看我不上眼，我心里明白，也认了。我算个什么呢？一个疯疯癫癫的瞎子、拐子。可是现在，你倒要让我小看了。”

他站起来，挟紧拐杖，在两张床中间，又开始

了他的逗号、句号的循环。

“一生下来，我就是个青光瞎。娘老子把我拖到七、八岁。老子一病入了土，娘改了嫁，剩下祖父拖着我吃八方^①。祖父不是无用之人，算命、跳神、看风水，无所不能。最能的是唱曲子。他唱起来，大人伢子，男男女女，没有一个不欢喜。四乡八村，个个说他能把雀子唱下树。逢上年节庙会，红白喜事，到处是人来抢他，恨不得把他分八瓣。可是他临到死，也只能把一肚子曲子、几册烂唱本留给我。

“我到而今还清清楚楚记得老头子过世那一夜。我们祖孙两个，偎着，靠在神龛下。我听着他有一声没一声地唱着《拆白歌》睡着了。后来，从坍了的庙顶上飘进来的雪，压熄了我们面前的火堆，我冷醒了，一摸，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，已经断了气。我拆下庙墙上的砖头，给他堆了座坟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摸索着，上路了。我依旧到处去唱。

“不是我自卖，那时我唱得实在好。人们都说我是祖父的替身。不敢说唱得雀子下树，十七、八岁的黄花妹子让我唱得心动的，实在不少哩。”他脸上又浮起一种近似于油滑的表情。好象在召唤那

① 乞讨